

图7 日本宽文七年(1667)京师书肆风月庄左卫门刻本《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录》(右图),即据明崇祯本(左图)翻刻。天一阁博物馆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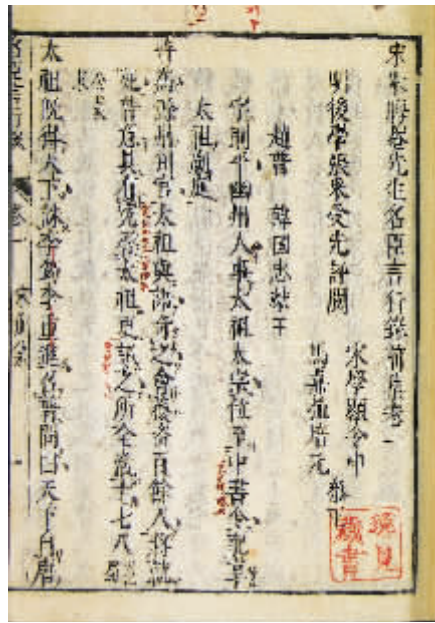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8 越南宋体字本



图9 越南喃文仿宋体字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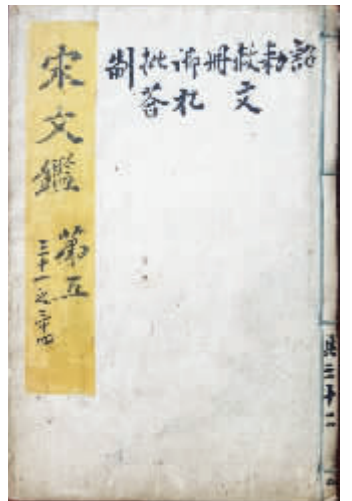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0 朝鲜改装中国本



图11 越南喃文仿宋体字本



图12 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在翻阅线装书

◀ (上接2版)

线装相对于包背装的优点主要有二：一是除了纸捻之外，再用线装订，使装订更加牢固，不易散乱。二是不用浆糊，书更容易拆解、重装。两者合观，线装较包背装拥有装订牢固、拆解重装方便两个相反相成的优点，其取代包背装，成为古籍装帧形式的终极形态，自在情理之中。

从存世书籍实物来看，简帛只见于出土文献；纸本卷轴装主要包括敦煌写经和少量传世卷子本；经折装主要是佛经；这三类基本都属于特种文献。蝴蝶装流行于宋元，但今存本绝大多数都早已被改装成线装，仍为蝴蝶装者屈指可数。包背装在明代前、中期比较流行，但如今存世的明代原装包背装极少，盖因包背装较线装更早且更易脱散，故大多也被后世改装为线装。因此，现存古书绝大多数都是线装。这是线装的独特优势决定的，也是古书被称为“线装书”的根本原因。

中国线装一般为四眼装订，用双股细线。明至清前期时，中间两眼之间的距离与上下两段距离大致相同，之后逐渐缩短，至晚清以后，就只有后者的一半距离了。明代原装的线装书存世极少，因其大多也经过了后世的改装。如大致刻于嘉靖年间(16世纪中叶)的《历代忠义录》，为四眼线装，用双股细线，线不染色，各眼间距离大致相等。其封面内粘有当时废弃的书叶，故可能是原装。(图1)

中国的四眼线装书出现之后，影响到朝鲜半岛、日本、越南的图书，装帧形式也都采用了线装或仿线装。朝鲜本的线装常见的是五眼装订，不像

中国的线装书以四眼装订为主。装订线常用单股染色粗线，而中国则一般用不染色的双股细线。如朝鲜时代后期印本《守梦轩文集》，为五眼线装，用深色单股粗线，各眼间距离大致相等。(图2)

日本江户时期刻本的线装也是四眼装订，中间两眼之间的距离与上下两段距离大致相等，当是仿自中国明代至清前期的线装形式。日本书的装订线用不染色的单股细线。如日本天明五年(1785)刻本《毛诗品物图考》，为四眼线装，用单股细线，未染色，各眼间距离大致相等。(图3)因是单股线，又比较细，所以极易断线，许多流传到中国的日本书装订线都因此而被更换。一部分江户时代的刻本仿朝鲜本用五眼装订，装订线用单股染色粗线。

越南黎、阮二朝的刻本装帧形式也是四眼，但不是完全的线装，而只是仿线装形式，类似于中国本中的毛装，俗称蚂蝗攀，用单股粗线或纸捻在第一、二和三、四孔眼之间分别穿孔系扎。如越南阮朝嗣德年间(1848—1883)刻本《启童说约》，用纸捻作蚂蝗攀式装订。(图4)

宋体字：汉字的规范

明代中叶以前，印本的字都是手书的楷体。明初内府刻本中的楷书字体，还曾传入朝鲜半岛，成为其官方铸造金属活字的字本。明宣德九年甲寅(1434)，朝鲜王朝根据中国内府刻本的字体铸造了著名的铜活字“甲寅字”。今天一阁博物馆所藏明永乐十七年内

府刻本《为善阴鹭》之字体，即朝鲜“甲寅字”来源之一。

宋体字是明代中期刻书中模仿宋代浙江刻本形成的一种新字体。宋代刻书以浙江为最盛最佳，影响也最大，官刻经史，私刻文集，皆负盛名。明代士大夫最喜收藏赏鉴此类宋本，并在刻书中极力模仿，最终形成了宋体字。与宋代浙刻本的字体相较，新形成的宋体字脱离了自然书写，书法意味较少，字体方正，横平竖直，棱角分明，更近于印刷体，易于工匠刊刻。宋体字出现以后，刻书中仍然坚持使用的自然书写字体就被称为楷体字。

宋体字出现于弘治年间的苏州地区，正德时期发展到苏州附近的常州、松江地区，嘉靖年间基本成型，分布于全国大部分地区。自此中国古籍印本的字形成了楷体和宋体分庭抗礼的基本格局。

万历时期的宋体字有所变化，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类字形较长，横细竖粗对比更加明显，如万历北监本《十三经注疏》。另一类宋体字仍然延续了嘉靖时期苏州地区刻本的特征，横平竖直，字体方正，结构较第一类紧凑，如万历本《礼记集注》。明末的宋体字比较多的一类字形也比较长，比万历时期第一类宋体字更长一些，如崇祯本《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录》。另一类字则比较扁，如毛氏汲古阁刻本《十七史》。

清代宋体字进一步发展，顺治至康熙初年以前，仍留存较多明代面貌，康熙中期以后逐渐形成清代的风格。此时的宋体字更加成熟、精致，字形不如明末清初长。乾隆时期，

▶ (下转4版)

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在翻阅线装书